

前言

本書原作者史蒂芬·羅蘭氏，是一位超然的，沒有政治色彩的畫報記者，因為不願把自己出賣，終於被大獨裁者以「莫須有」的罪名下獄。他的妻子，為營救丈夫，也遭受同一命運，拘禁了六個月又半。

書中所敘，都是作者和他的夫人所親身經歷，親自見聞的實錄，沒有一事無來歷，更沒有一語是虛構。這裏所能看到的，是獨裁暴政下人們的呻吟、惶恐和生命的沒有保障。雖然所記的是作者和他夫人的遭遇為多，却已足夠暴露了「獨裁」下人們的憤怒和自覺。

譯者徐柏堂氏，是一位尚自由的教育家，翻譯本書完竣後，為了上海嵇山中學立案事從香港到陪都重慶，不意於回歸途中，值「十二·八」太平洋戰爭爆發，在香港旅居中波流彈犧牲。當他譯完本書後，曾有過這樣的一句話：「希望在這次大戰後，結束了獨裁，人類永享自由……」現在，大戰總算結束了，確是人類的自由，還有待於將來，所以本書的付印，或者不是浪費罷！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在慕尼黑獄中——

我已在獄中一星期了。我不曉得爲什麼緣故被監禁，也不曉得何時可以得釋放，更不曉得將來要受何種的處分。

起初我以爲只要一經審問即可釋放。現在我可不是這樣想了。我恐我終不能生出此門。我常覺得我似乎是已經死了。我睡在床上，二眼看着屋頂，不知經過多少時候，竟毫無感覺，也想不出一點辦法；有時突然警覺了，滿心又想逃生。我覺得我尚有許多方法，許多精力，許多思想。不過這也只是如電光的一閃，暫時的快樂。不久死的念頭又來，我終於無法擺脫。死，我掙扎着想。我自己辯論着。我準備不要活了。我心一橫，我決定了我的命運。但我舉目一看，見這牢間污穢灰色的四壁，我尚能觀察。

我拿起只鐵的口杯，我觸着這冰冷的鐵，我尚有知覺。

我側耳一聽這許多囚犯的聲喚——不斷的悲苦呻吟呼痛聲，我尚能聽聞。

我忽然又覺得歡喜。

我還是笑着！

今日獄卒給了我點紙筆。這是我請他替我辦的。大概他不高興向上級去請示，所以沒幾分鐘，就從獄中貯藏室取還了我的筆記簿同我的鉛筆。

當我初到此地時，他們就把我的紙筆都拿了，現在又給我找回來了。這好像一個久違的親友，突然的重逢。高興極了，我一時竟不能作有系統的思想，只是拿着筆在簿上疾寫，也不曉得寫些什麼；寫的都沒有什麼意思。

我全身發顫，我是發熱了。我像發狂樣的寫着。直至手指酸痛不能再寫為止。然後我又把他一二的撕了，回到床上放個頭便睡。

這樣的一寫，我的頭腦居然覺得輕鬆了。我一納頭便沉沉的睡了一個整下午，也不做夢，真像得了昏睡病一樣。

我在幾分鐘以前才醒了轉來。獄吏已從外面把燈開着了。時候已將傍晚，獄室內裝有一盞

小小的電燈泡，嵌在屋頂上，外面罩着穿有小孔的鐵板。這慘淡的燈光，愈使這獄室較日間更加慘淡。

我在室中來回的踱了一陣，好像囚在籠中的獅子一樣，沒有片刻的停止。我沒有書看，二眼就望着空發瞪。我就倒在床上昏昏的睡去了。

我忽然又記起了筆與紙。

我從床墊下取出這兩件寶物，就開始寫。我寫這牢獄的情形，寫獄中囚徒的苦痛，我像寫新聞的寫法。

然我不覺又停筆發瞪。有什麼用處？為什麼要寫？寫給誰看？

決沒有人要看這些文字——沒印刷所肯排印——沒紙可以印，或者此刻寫字的手，明天就會死。

我不勝失望，不勝沮喪，不勝灰心了。我又把所寫的統統撕掉，重新在獄室中來回不停的踱着。

我忽然膽壯了起來，我的新聞記者的血突然的沸騰了。

「只要我活着，有紙筆，有呼吸，我終要寫！」我大聲對着灰色的牆壁喊着，似乎牆要阻止我的樣子。

我發狂似的這樣自言自語。我的喉音也變了。我彷彿從遠處聽着別人講。

「我決定要把我在獄中所見的新聞都寫下來，我要把我親身所經歷或將經歷的種種都記下來，要把國社黨瞭混世人的地方都記下來！」

然我一停步，這獄中更靜寂的可怕，我不禁把頭埋在手中呆了。我的額角火熱，思路也昏亂了。我不禁又躊躇起來。

我真的要寫嗎？我要冒險寫日記嗎？假若政治警察在我身上搜了出來，這不是都完了！恐怕沒有人再能救我呢。

「死有什麼要緊！」我心裏不覺忖着這樣說。

我於是決定了。我一定要寫。

我要盡我的能力把我所寫的儘送出獄外去，我要用各種方法，使外面的人知道這第三德國幕後所做的種種。

或者因為我這樣做，以前不要聽的，現在會要聽了，以前緘着口不做聲的，現在要開口了，以前消極不動的，現在要奮起對付這野蠻了。或者這上萬無辜的囚徒，可以早一天從德國的政治監獄中得到了自由。

我決定這樣做。我拿筆與紙靠在牆上寫。現在我膽壯了，我已經重新得到了一個人生的目標。

我在慕尼黑第 22 號囚室裏面，開始寫這些。我初進來，是囚在第 22 號牢裏，那間屋小而污穢，黑暗，沒有桌椅，只有一張床與一個便桶。牆壁非常醜陋，靠屋頂的小窗，已經有多年不打掃了。壁上厚厚的塵埃中有一「希脫拉」的名字，是前次被囚的人用手指頭劃着寫的。在便桶的對面牆上，另一囚徒曾用紅鉛筆寫了共產黨「國際歌」全首的副歌。

這間房裏從前曾囚過國社黨與共產黨徒的。現在我竟替了他們。室內除我外並無別人，我一個毫無政治關係的人。

我是以政治嫌疑被囚的，正如其餘千萬的人一樣的被巴伐利亞政治警察所逮捕。

但在這牢獄外面，新的德國正在創造。全德國人都在慶祝歡娛，希脫拉是他們雪恥復仇的救主，國社黨便是自由。不過這大衆的高歌酣舞，並不光臨這悽寂的牢獄。此地沒有火炬遊行，沒有花圈；此地是國社黨脫了面具的真面目。此地只有野蠻，只有褊窄，仇恨，與復仇的主張。

我的囚室只有三步長——來回只是三步。這是間狹窄的小屋，但全德國是幾何的狹窄呵！我深深的想，想明白何以全德國人會把整個國家交給希脫拉並他的心腹。他們為什麼毫不猶疑的一任他們的一領袖，——將這產生詩人與學者的祖國，變為狹窄與野蠻的產地。

我一想到德國的將來，不禁大大的失望。德國究能再逃得過這可怕的難關嗎？德國的人民能太平無事的渡過這國社主義的磨難嗎？

這不幸的德國。在過去的幾年裏，已受了無數的痛苦！她的前途又將如何荆棘叢生呢！她已經多次信任她的領袖，她已經多次的失望了！

「他或者能渡過這一關，」當我與一個巴伐利亞的農夫討論希脫拉的時候，他這樣對我說。「讓他試一下，他或者能成功，他曾答應我們，說百事都能比前好點的。」

成千成萬成百萬的人，都像這農夫一樣，表示這種意見。希脫拉會應允每個人幾件事，德

國人就這樣相信了他。他們願意這樣的信他。

因為德國人以前飽經戰禍，通貨膨脹，失業，飢餓，與窮苦，而成懦弱了。他們前途確是太黑暗。現在突然來了一位教他們放心的人——一位應允光明的前途的人，他說以後可以沒有失業，沒再飢餓，沒再愁苦。

德國人總是這樣的準備着被欺騙，被誘惑。他們是願意受這樣一個人的領導。

希脫拉對他們說的話，簡單一如他們自己的話——他們能了解的話。他對他們說，假若他們願意這樣做，同心合力的做，他們決不再會被別人看作第二等的國家——世界各國又要怕他們敬重他們了。

他對他們說，他們的種種吃苦，猶太人都應該負責，因為可賺錢的事業，都被猶太人佔了。只要你們把猶太人逐走，你們就有工做。

他答應了工人提高工資，答應小商店去壓迫大公司，答應律師與醫生去放逐猶太的同業。農夫可得高紅利，失業的因建設得工做，官吏的得終身的任命。總之他答應了每個人的要求。但同時他却從工業家領取了上百萬的津貼，為他們撐腰，去壓迫工人。

然沒有人似乎會想到這種允許，是彼此互相矛盾抵觸的。今日的德國人實在不耐煩想了。他們只要迷信。

信仰信仰！信仰！

他相信救主的時代已經到了——即使是假的，也好。

德國人一向是迷信神奇的事蹟的，即如「使徒」英那士維因勃那樣用奶油治眼病的人也有成千成萬的信徒。有個律師叫文脫的，他想競選做總統，居然提議將不值一錢的戰前千元的「馬克票」仍復在市面行使，也有成千的人相信他，投票選舉他的。

現在他們相信希脫拉是獨得天佑的，是他們的救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實是無足奇異的事。

希脫拉講統一：講聯合統一的大德國。他動人的言語，挑引了德人的願望。他旅行各處，不倦的講。用激越的言語，麻醉了人民的智慧，刺激他們的耳鼓，叫他們驚醒起來。

我有一次親聽過他的演講。他起頭就高高的喊了聲，「德國。」他停一息，又照樣喊了一聲，「德國。」不過較前一聲更響了。他停了一停，第三次他又把這對德人具有魔力的二字，用着暴

雷似的聲音叫了一聲。「德國！」

許多人曾見過他說這二字的，就曉得他演說成功的理由了。他的動人的情緒，麻醉了整個聽衆，像受了催眠一般。全場的人聽得喜時則高聲狂呼，憤時則厲聲怒吼，說到悲傷之處，則又俯首啜泣。此時的會場可說已有神祕的性質，脫離了政治意味了。這簡直使全體的聽衆化爲迷信神蹟的人了——這種神情只有德國可以見到。

希脫拉以奧國漆匠出身的人，居然能講得令他們如此沉醉顛倒。

全德國的人現在都已昏沉睡着了，他們正在做一個可怕的惡夢呢。可怕的覺悟的時候，也終有一日要來。他們惡夢醒了神志清了的時，一定要覺悟他們又被人牽引，受人的愚弄了。

忽然門匙一響，我急藏了我的筆記簿，門隨即開了。

「晚飯來了！」獄卒叫了一聲。

警察局包飯作的女侍者拿了冷肉同乳酪進來——代價是六十幾尼。

「拿水來！」

我拿水盆給他，換了點清水進來，預備明晨應用。

鑰匙一響，門又下鎖了，門外又加上了栓。這一天完了。這時正是七點。獄中的夜景才又開始。獄吏的腳步聲，在走廊中漸漸不聽見了。現在一點聲音都沒有了，除了那一室的獄囚時斷時續的喊痛聲。他一面哭一面這樣不斷的重復喊着：「唉，上帝，我做了什麼，你把我弄到這裏來！唉，上帝……」他這樣悲嘆了一個多鐘頭才停止，大概已經睡着了。

這靜寂實在可怕。慘淡的燈光，從穿孔的鐵罩裏透出來，使人感覺得陰森淒慘。這彷彿有種死的感覺，使你似乎是在半夜裏從驗屍所中醒來的樣子。灰色的牆壁，四週死一般的靜寂。沒有別的生物看見或聽見，沒有聲音，沒有動作。世界是遠離了你。真冷靜的得可怕，似乎這世界上只剩你一個人的樣子的悽寂。

我的思潮便忽然飛回到我幾天前自由的日子去。一切我都記得很清楚，清楚得彷彿像一小時以前經過一樣。

這過去了的最後幾天，彷彿如水晶一樣的清澈，深印在我的腦際。

這種過去時日的回憶，竟爲我獄中唯一消愁遣悶的方法。回想昔日的自由和快樂，暫時忘了牢獄的苦悶。

我把舊事一一的從心頭溫起，——各事的細節也都重新想起來，甚至人家對我所講最無關緊要的話，我都能一一很清楚的記憶起來，我且記得那時講話的聲音……

我在獄中無聊，就把各種背景，都一一的擺到眼前重行排演起來。背景慕尼黑。時間。三月九日，國社黨革命爆發的一天。

我就把那天與我有關的各節都回憶起來——這有關德國將來歷史重要的一日。

這確是件好玩的事。我思想一集中到這一點，腦筋就不斷的活躍起來，無暇再作別想了。這灰色的牆壁也不見了。一，二，三——時日似乎忽然的跑了回去。我已脫離了牢獄，飛回到「自由之鄉」了。日歷上正標着三月九日。這是個很早的清晨，我正朦朧的在床上睡着。

愛德輕輕的在叩門「爸，你起來了嗎？」

這孩子溜了進來，走到我的床邊，與我吻了早安，纏着要我如往日一樣的講獅與象的故事給他聽。

「後去獅子走到象那裏，並對他說：象兄，現在有一百隻猴子侵入我的國裏，正吃我所有的東西。你能助我一臂嗎？」

「象想了想，用鼻子擦了擦耳朵。」

「好，讓我想想看……」

愛德聞睜了兩眼，釘着了我的嘴唇，聽我講得出神。這故事他已經聽得爛熟了，不過他還要我反復的講給他聽。

故事剛才講完，我的理髮匠已在盥洗室裏等我了。他一面在我面上刷肥皂，一面就七搭八搭的講到政治問題。

「唉！你知道的……希脫拉那傢伙……這些人竟要他……他不過有個好嗓子……他不能做什麼……他現在居然做總理了……不過我們巴伐利亞不要他……我們有個天主教的政府夠好了……我們要有個皇帝的政府……一個皇帝……不過不是希脫拉……普魯士要他……我們不要他……我們不要國社黨來此地。」

他替我修了面後，正色的對我說「此地的百姓不要再聽希脫拉的事情。」

誰能在晨間料到今日午後會發生絕大的變故呢？誰能料到慕尼黑當晚會到希脫拉與國社黨的手裏呢？

這天陽光甚好。我一早就離了家，覺得空中到處都是春意，再過幾個星期，可以到史帶堡河中游泳了。

枝上已是茁着嫩綠。英國公園的紅蓓花，不久要開花了，等到花一開，慕尼黑的居民都要說：「春光回來了！」

但天氣還是很冷，從伊薩山吹來的風又冷又尖。在山中各處，氣候還是很冷，在街的盡頭，福老海姆林，還是裹了厚厚的圍巾，叫賣糖炒栗子。福老海姆林賣栗子的時候，氣候總是像冬天的。電車緩緩的繞行麥克米倫紀念碑。大家都上事務所去，都緩緩的徐徐的走着，沒有一個人現着匆忙的樣子。

我也逍遙自得的沿着街走着。

麥克米倫街此時還沒有行人，不過在維耶納旅館面前有點熱鬧的情形。我走過門口時，旅館的大汽車正載了一車美國的游客到來。腳快正在把沉重的旅行鋼箱搬進旅館去。

在國家戲院面前，有個年老的乞丐坐着餵鴿子。鴿子飛下來停滿了他的頭上與手上。和平——美麗，與完整。這慕尼黑的和平……

各處窗子上正晒着被單。好潔的主婦，正從樓上在過客的頭上，揚着拍破的拂塵。

在「它尼失爾」的門外，有許多人正縱橫議論着。我從門內一望，見裏面已坐了許多人。慕尼黑的肥胖的居民，已在飲他們的早酒與吃烘臘腸了。

馬李氏街的交通警察已高高的立在月台上，姿勢神氣得很，他舉起手，神氣活現的允許三輛汽車與卅輛腳踏車朝塔爾街那方去。他的鋼帽在日光中晶瑩的閃耀着。他筆挺的站在街中的木板月台上，威風凜凜的指揮着車輛，他似乎估量他的工作比全德國人工作的總和還要重要，即連總統也得包括在內。

在市政廳門前有許多汽車夫聚着閑談。其中一個肥碩的漢子，蓄着長長的唇鬚，正咀咒啤酒市價的奇昂，「我不曉得這世界要怎麼了，每人連買杯啤酒喝也沒錢了。」他大聲怒氣沖沖的講，他的同伴都只搖搖頭，大家都似乎付着說，「塞卜講的真不錯。」

和平。慕尼黑的美麗的和平……

到了高芬格街，我遇到一個熟人。

「早安，羅蘭先生，今天好麼？」這人這樣叫着。

這是我們的信差，他很高興的在招呼我。我們都是到報館去的，所以就一同走。這老頭兒就一路嘮叨着。他一開始就滔滔不絕的說，「不錯，你知道的，氣候快要好了。我從我兩腿上可以覺得。陽光一來，我的痛瘋症就好了。今天早上我的二腿已不覺得什麼痛楚了……」

他一路講了一大篇他的痛瘋症的各種症狀。據他說，從他的症狀變化上，可以預測列各種氣候的。

我耐着心聽他這種氣候測驗的報告。

我們在聖特林街轉了灣，停在我們出版公司的大廈前。

「我們快要有鮮花放在沿窗的花箱上了，」他邊說邊指着房子。

「再二星期後，春要來了。」

我們仰着頭向屋的正面一望，見窗上已擺着許多花草。

這信差在公司裏服務已有廿年之久。我總共不過只有五年。但我們對公司的感情却是一樣，大家都很高興能在這裏做事，每日都希望好好做一天工。這裏不但是我們的辦公室，也是我們各人的老家。

有二千多人在這裏服務，二千多人都覺得他們是屬於一個機關。每人都覺得是這一個大家庭的一分子。

這並不是說我們都有一樣的見解，決不在德國決不會有這一種情形。公司各人政治見解之不同，正如其報紙，記者，僱員，一樣的多而不同。（不過我們中間，沒有國社黨和共產黨員。對這一黨，公司會激烈反對的。）

這公司所刊行的日報，慕尼黑黑日報（當地的唯一大報）的政策是守舊的，屬於天主教的，保王黨的蒲屈爾主筆與白魯銀政府都有密切的接近。該報政治主撰愛丁男爵是巴伐利亞皇家聯盟的主要領袖及魯伯利西太子的親信顧問。

然在另一方面，這公司的週刊（蘇台登星期週刊）的政策與牠的主筆瓦德曲必克却是主張平民主義與自由主義的。

我們的晚報——與其主編拉皮却有社會主義傾向的。

我所主編的慕尼黑黑書報，為德國南部最重要的圖書週刊，是唯一毫無政治色彩的刊物。牠的唯一政治見解，只是不信任國社主義，這一主張為德國大多數大報所同有的。